

文化视野下的 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研究

丁楹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文化视野下的 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研究

丁楹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视野下的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研究/丁楹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668 - 2044 - 0

I. ①文… II. ①丁…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南宋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5661 号

文化视野下的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研究

WENHUA SHIYE XIA DE NANSONG GANYE FENGQI YU WENXUE CHUANGZUO YANJIU

著 者 丁 楹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张仲玲

责任编辑 黄少君 姚晓莉

责任校对 何 力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622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5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 2016M592154)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项目编号: GD11XZW06)

肇庆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基金
资助

目 录

- 001 绪 论 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一个有必要深入考察的文化—文学现象**
- 001 一、回顾与判断：相关研究的述评及选题意义
- 008 二、问题意识：创新的尝试与期待
- 011 三、渴望超越：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033 第一章 人际关系、文人干谒与南宋文学**
- 034 第一节 诚斋之风
- 038 第二节 放翁气象
- 042 第三节 白石意度
- 046 第四节 余 论
- 050 第二章 高压政策、文人干谒与南宋文学**
- 050 第一节 “权”“势”的构成与作用
- 052 第二节 党同伐异的文化性格与道学兴废
- 058 第三节 南宋士人群体人格的历史考察
- 060 第三章 名流印可、文人干谒与南宋文学**
- 060 第一节 小故事、大问题——名流印可对南宋士人前途与命运的影响
- 074 第二节 名流印可盛行下的文人行卷
- 081 第三节 反思中的开拓——南宋士人对前辈名流印可的态度
- 085 第四节 名流印可与南宋文学风貌
- 096 第四章 名流荐举、文人干谒与南宋文学**
- 096 第一节 名流荐举与权力体制
- 102 第二节 人情与干求——中国式的入世原则
- 106 第三节 南宋名流荐举的制度考释
- 111 第四节 眼光识鉴——名流荐举的前辈风范
- 120 第五节 徇情枉法——名流荐举的历史反思

128 第五章 科举入仕、文人干谒与南宋文学

133 第一节 从苏轼科场案看南宋士人的干谒心态

139 第二节 座主门生与南宋文人干谒

146 第三节 嗜利之习与南宋文人干谒

156 第四节 入仕艰难与南宋文人干谒

182 第六章 文人入幕、干谒之风与南宋文学生态

183 第一节 “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能动”时代

202 第二节 战国策士的主体特征

233 第三节 南宋幕府的文学生态

259 第七章 文章信美知何用——南宋文人的干谒方式及其表现

259 第一节 四方奔走

274 第二节 忍辱负重

293 第三节 结交名流

305 第四节 沟通铺垫

318 第五节 投契逢迎

328 第八章 干谒与隐逸——南宋士人进退出处的矛盾及其消解

329 第一节 传统仕隐观及其对南宋士人的影响

339 第二节 南宋士人对陶渊明的吟咏

352 第三节 南宋士人对白居易的认同与效仿

365 第四节 南宋士人的隐逸人格风范

380 第五节 结 语

383 参考文献

400 后 记

绪 论

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一个有必要深入考察的文化—文学现象

在当今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中，要想有所突破和有所进展，无疑需要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开拓。我们希望能变换视角，在南宋文学尤其是南宋词学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即使不能超越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也希望能在认真学习这一时段文人群体的相关作品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抒发一些自己阅读古典文学的感受，表达一些对南宋文学研究的看法，不求惊世骇俗，但愿新人耳目。

童庆炳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指出：

文学从来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发展着的，它总是与其他文化形态互动中存在着发展着。文学中处处渗透着文化的因子。^①

以干谒活动为中心来研究南宋文人群体，是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在方法论上属于文化学的研究范畴。干谒活动，是南宋文人普遍经历过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人生境遇，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社会一种特有的文化表现形态，干谒有其自身的生成、发展规律。对于与干谒活动关系密切的南宋文人，我们考虑较多的是如何将南宋文人当作中国传统文化形态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表现来加以考察，以便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下寻求一个较合适的切入点，从而能够切实、准确地阐述研究对象。

一、回顾与判断：相关研究的述评及选题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唐代干谒与文学研究在重要诗人及综合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研究的深度上还需要加深，范围上也需要拓展。^②而与南宋文学密切相关的干谒活动，则还较少有人关注。

在历来的文学史和宋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的研究，一直很少

^① 童庆炳：《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

^② 详参王绡：《唐代干谒与文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页。

有学者问津，长期以来被文学研究界所忽视。截至目前，学界有关南宋文人干谒问题的研究，相关成果主要如下：

夏承焘于1956年9月撰写了《姜夔的词风》一文，在此文中，夏先生明确指出：“白石一生不曾仕宦，除了卖字之外，大都是依靠他人的周济过活的。”^①并结合姜夔的干谒活动对其词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对南宋文人干谒现象做了开拓性和基础性的研究，而且为当今学者从事宋代文化史、制度史与文学史的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对我们深入探索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夏先生目光如炬，他的名作《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体大思精、地负海涵，贯穿于古今中外，以丰富的资料积累、磅礴的理论气度和深入的分析解读，建构出江湖文士姜白石研究的新框架，显示出学术研究的大家气象。

夏先生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②他高超的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有助于他对历史上各种文化活动、文学现象、文学思想的观察研究。察古观今，此之谓也。对南宋江湖文人姜白石生活方式的研究兴趣，使夏先生乐在其中，视艰难的学术之旅如歌如诗，虽鞠躬劳苦而始终如痴如醉。因此，他这部为南宋江湖文士姜夔作品编年笺注的经典之作，能够使古人的生命心魂、人生智慧得以再生，并通过自己的研究，让姜白石的智慧、品格、襟怀和修养，灌溉滋润我们当代人的心田，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智慧永放光芒。夏先生才气之高、气魄之大、境界之深，对词学史、词学理论、宋史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涉猎之广、钻研之深、用力之勤、评介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袁行霈曾在《学问的气象》中说：“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在他们的手里，资料的采用和组织灵活而有规矩，出神而又入化，犹如魔方的组合，而不像积木的堆垛。他们治学的道路平正通达，思维的逻辑清通简畅，如书法之笔笔中锋、万毫齐发、力透纸背。……‘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气象何等恢宏！如果借用来形容学问，‘尽挹西江’可以说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搜集起来；‘细斟北斗’可以说是把有关材料细细地加以辨析；‘万象为宾客’可以说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学问能到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③夏先生治学有大气魄，他所著的这部《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就体现出他研究学问时恢宏大度的气象。他的研究紧紧围绕姜白石一生中的文学创作，以辽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力图在时代风尚、文人交往、公共关系、生活观念、审美习俗、古今对比等文化大背景下，全景式地阐释南宋江湖文人的某些论题。从实证研究基础上对南宋江湖文人进行了系统的开拓，对姜白石词所做的分析及其在中国词学史上价值的阐释，卓尔不群，迥出时流，真知灼见，随篇可见。对南宋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及广大词学研究者来说，这部著作，既是指导研究实践的入门必读宝典，也是广大国学研究及爱好者进入传统文化这一繁茂园地的典范之作。通过此书，读者既可一窥南宋词学的

① 夏承焘：《月轮山词论集》，《夏承焘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② 详参丁楹：《寓教于乐——以夏承焘为中心的民国时期教师教学风格初探》，《肇庆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③ 袁行霈：《学问的气象》，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2页。

精髓，也可进一步认识与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大气方能成大器，夏先生治学从大处着手，他的大气成就了这部白石词研究领域空前的巨作、优秀的楷模。

张宏生在《江湖诗派研究》中既历时地探讨了江湖文化的起源、发展与变异，又共时地探讨了南宋江湖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建构出南宋文学流派研究的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该书第二章“文化传统的倾斜——江湖谒客的生活形态及其他”和附录二“南宋江湖谒客考论”对江湖谒客的生活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把南宋江湖谒客的成因主要归纳为：“宋室南渡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阶级结构的急剧变化”“科举考试的艰难”“冗官的不断增多”“士人生活水平的低下”“都市生活的吸引”等，^①颇有新意，并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作者的语言文字功夫很扎实，论述文字流畅老到。该书本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在程千帆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很有学术价值，体现出作者高度的理论修养和深厚的文献基础。^②

张教授的这本专著，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南宋江湖诗派的著作，不无填补空白之功，开拓了南宋文学研究的领域。该书有三大特色：一是内容新颖，全书新见迭涌、灵采焕发，书中每一个章节都透露出作者的真知灼见。二是理论联系实际，该书挖掘出了江湖文化中许多深刻的文学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哲思和鲜活生动的具体事例紧密结合在一起，作者特别注意通过具体的生活事例来说明南宋江湖文化的理论问题，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享受到文学思想的归纳、审美的愉悦，深入浅出，不断引导读者向纵深开拓，给人以感性材料和理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深刻启迪，为南宋江湖文化的研究总结了新鲜经验，对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工作都具有深刻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三是立足文学本位，高度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解读，书中对南宋江湖诗人诗作的评析，颇深入细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体现出作者较好的艺术感受力和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鉴赏能力，^③并上升到理论阐述，对南宋江湖时期的文学遗产进行了系统的发掘、爬梳，整理提炼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又广泛汲取西方文学理论的新观念，并将两者融会贯通，形成了体大思精、地负海涵的知识体系，显示出张教授恢宏广博的学术视野、丰富多彩的审美体验与精深独到的理论见解。

另有费君清的《南宋江湖诗人的谋生方式》一文也是探讨南宋江湖诗人的名篇佳作。费先生通过收集和分析资料，发现南宋江湖诗人比较重要的谋生方式和经济来源有：①干谒权贵，获取钱财；②投亲靠友，接受周济；③出卖诗文字画，兜售个人才艺；④教书授徒，代人撰述等。^④费先生的文章以“谋生方式”或“生计问题”名篇，选题别出心裁，很有新意，多角度探讨了南宋江湖诗人的生活方式，拓展了南宋文学研究的领域。他的文章内容信息量十分丰富，既有纵向的流变考察，又有横向的南宋文人谋生方式特点的分

①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0-338页。

② 此书价值，详参傅璇琮为《江湖诗派研究》所写的序，见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页；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516-521页。

③ 关于张宏生的艺术感受力和对作品的赏析能力，可参张晖：《鉴赏的意义——读宏生师〈读者之心〉》，载张晖著，张霖编：《朝歌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1-226页。

④ 费君清：《南宋江湖诗人的谋生方式》，《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另见费君清：《南宋江湖诗人的生计问题》，载沈松勤编：《庆贺吴熊和教授从教50周年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212页。

析，既评析南宋文人的生活实践，又总结有关干谒诗文的创作特色，更注意结合当时政治气候、文化环境和作家谋生时的心态来考察文体发展变化的深层历史动因，视野开阔，论析有深度和创见。文中涉及南宋江湖时期的干谒风气、文人的干谒方式、干谒对象和干谒时的精神状态，以及干谒对南宋江湖诗风的影响等方面的系统论述，让我们了解到南宋历史上江湖士人真实、鲜活的谋生方式。费先生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能够立足文本，融化古今。他的文章既具理论色彩，又可从中看出作者的文献基础与朴学功夫。费先生还独具灵心慧眼，能够妙手剪裁，博采现实生活实践之花，嫁接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木，运用南宋江湖士人“谋生方式”“生计问题”中表现出来的生存智慧来关注我们现实的人生和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当我们深陷世俗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中，面对不可阻挡的物欲横流，该如何维持自我内心世界的平安喜乐，寻找人生的出路呢？费先生此文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迪与思考。此文最大的特色就是全面深入、广泛系统地研究了南宋江湖文人的谋生方式与生计问题，深掘传统文化的底蕴，并结合南宋江湖士人的生活实际，展示他们人生智慧、个人才华的适用范围及时代需要。这为解决南宋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思考与人生启迪，于他人不到处别生只眼，寄妙理于陈规之外，出新意于故纸之中，让人感受到冷静而理智的学术品格与内在的对人生之路探究热情的融合。因此，此文的研究方法十分便于效仿，我们可以据此深入南宋文人的生活实际，探究他们在干谒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及他们解决问题的各类具体途径。

沈松勤在《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一文中具体分析了“绍兴和议”期间文学生态的环境因子，认为高压政治使创作主体锐气顿失，呈现出集体失语症，使之奔竞于适应高压政治的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中，创作了汗牛充栋的谄诗谀文，成了宋代文学史的一个转折点。^①在对待人性、政治、权力、道德、风尚、社会、文化和文学诸问题上，沈松勤都有许多非常深刻、精辟的见解，并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作出了令人深思的论述。

沈松勤的专著《南宋文人与党争》，以从史学入而从文学出的治学方法，考察了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党争及其与当时文学之间深层复杂的内在联系。这本著作不仅是一部体大思精、纵横捭阖的南宋党争史，同时也是一部激情洋溢、斐然成章的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他深刻剖析了南宋士大夫在官场上的沉浮起落，当时权力斗争的波诡云谲及在其中显现出来的人性中的光辉与弱点，为我们一层层打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高贵或痛苦的灵魂。沈先生引用南宋许多名流显宦的真实案例，讲述了他们如何在高压政治下奔竞请托的情形，高压政治如何改变了传统士大夫直道事人的处世态度与为人方式，这些士大夫又如何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提高社交活动能力并增强文学创作的趋同性，从而改变了当时的文学生态。

沈先生敞开思想去分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及对其影响很大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生态，努力破解当时的人情世态、时代风气和文学创作之间深层复杂的内在联系。他真

^① 沈松勤：《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第55-69页；另见莫砺锋主编：《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1页。

实地揭示出南宋士大夫的精神状态，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展露中国古代文人在特定时期灵魂深处的污垢和精神境界的萎靡，深切洞察了南宋政治的黑暗复杂及当时士人的悲惨命运，并通过描写高压政治下的文人生态，解剖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值得悲悯的病态人格，能于绵密深厚、委曲周至的分析论述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历史真相与文人本意，揭示出蕴含在士人悲剧命运中更深层次的一面。从中我们可以照见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窥见他们的影子、惊悚自己的命运。^① 这种研究以新的眼光、新的方式表现出了新的意味，为我们的研究开启法门、点上明灯，提供了新颖、独特的视角。此书的独到之处：融合历史学、文学、哲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文化学于一炉，纵观古今、融合中西，把深邃浩瀚时空中的个人与民族、古代与当下、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与思索都总括于其中，真知灼见、精辟独特，迥出时流、新人耳目，由其著作可见沈教授研究内容之深广，借以知作者治学堂庑之大也。

每个人生下来以后都受到特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自然就有权利和义务对这种培育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反思与批判，从前人的经验或谬误中汲取人生的智慧，照亮未来的人生之路。王瑞来着眼于“宋元变革论”，撰写了一系列发凡起例、体大思精，拓土开疆、独辟新境，以史证文、以文证史、文史相济，根底深厚、情理兼胜的名篇佳作：《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②《“内举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③《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经仕履考析——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三》^④《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四》^⑤《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⑥。以上任何一篇文章，皆源出文史、辟域浑茫，以辟疆拓土的识见，开掘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中，王瑞来指出：“南宋继承北宋科举取士的官僚再生产规模，大量通过千分之一高倍率的激烈竞争及第者，在仕途上遭遇到比北宋更为激烈的新一轮升迁竞争。多数在政界缺乏背景的普通及第者，尽管可以成为低级官僚，由于制度上和人际关系上的因素，却几乎无法挣脱出通向成为中高级官僚的瓶颈。严酷的现实让对仕途绝望的士人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导致士人流向多元化。”他认为“宋朝的政治家为普通平民百姓敞开了一扇充满光明的通向仕途之门，接着又半掩上了第二道门。而第二道门才真正是通往风光无限的顶峰的山门。穿过这第二道门，才是士人多年寒窗苦读的真正目的。然而这第二道门却不易穿过。穿过第一道科举之门，尽管千里拔一竞争激烈，但毕竟主要凭自己的努力，顶多是加上家族的财力支持。如果成绩不成，神仙也帮不上忙。然而，穿过第二道入官之门时，却基本上失去自己把握命运的能力，前途掌控在他人手中。选人本人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做出政绩这样

① 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图景，他们的选择与命运，可参见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增订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② 王瑞来：《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国际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③ 王瑞来：《“内举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④ 王瑞来：《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经仕履考析——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三》，《文史哲》2014年第1期。

⑤ 王瑞来：《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⑥ 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

的‘硬作为’，与广结人脉、钻营于权门这样的‘软作为’。……金榜题名后的风光不再，仕途上的艰难跋涉最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南宋的社会环境有别于北宋，对外关系紧张，地域势力崛起，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在这样诸多综合因素的作用之下，士人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的多元化，成为推动南宋至元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①。

接着，王先生在《“内举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中继续深入研究“宋元变革论”，指出：“质的突变一定是源自量的积累。人心的质变也当是出于精神的决绝。不撞南墙不回头。屡撞南墙，自会改弦易辙。在科举之途，像范进那样偏执的坚持者毕竟是少数。南宋以降，艰难的仕途让大量士人望而生畏，忍痛割舍，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不再目光向上，转而投身于地域社会，来谋求生路，来寻求实现自我价值。这种状况，逐渐促成士人流向多元化。利弊互动，绝望带来新生。士人流向，作为众多因素之一，汇入涌动的变革潮流，推动中国社会在宋元转型。”^②

我们之所以不惮辞繁地引述上述材料，一方面旨在对王先生笔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的具体观念作尽可能真实、切合实际的历史还原，以描述清楚南宋士大夫主体人格和审美情趣形成的环境和意义；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这一大段文字蕴含了大智慧，既滔滔雄辩又生动有趣，很能说明王先生的论述风格。对宋元文化转型期如此通透的见解，绝不是一辈子皓首穷经、困死书斋的老朽宿儒说得出来的，也绝不是一味崇洋媚外、奴颜媚骨的新学士子所能道其万一的。只有能入能出，既精通传统文化，又吸收外来学说的通达之士才能达到这种思想高度。这是洞察力、才子气、思想家、史学家的融合贯通所产生的一种学术境界。

王瑞来的研究，在深入分析正史记载、野史笔记和文人集子的基础上展开，其文章中涉及的大量历史细节不仅还原了南宋士人真实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披露了那一时代文人奔走请托、援引荐举的真实场景，破解了不少史学与文学中的疑团和误解，还构建了一部“宋元变革史论”，使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南宋大时代下的历史潮流及宋元文化转型的余风遗韵。这些研究，体现了王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这对我们“文化视野下的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告诉我们应当用何种态度、何种方法去面对我们的研究对象。^③

王瑞来主张的宋元变革论，注重南宋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从探究宋元时期文化环境、民俗风习和士人的生存方式入手，采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对已经刊行的文献资料

① 王瑞来：《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国际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8页。

② 王瑞来：《“内举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27页。

③ 王瑞来还有一部专门研究宋代士大夫心术权谋及其对中国历史走向影响的专著——《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版），其洞幽烛微处令人耳目一新，不乏启蒙意义，在当代琳琅满目的历史类著述中，是颇值一读的传世佳作。王先生的研究态度、研究视野、研究方式与众不同，他精研宋史三十余年，从容淡定、不急不躁，沉潜文献、精研学理，才气之高、见识之奇，令人感佩，实现了宋史研究在学术观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的全面创新。以一位史学家的人文关怀深入挖掘宋型文化的底蕴、精髓，以旺盛的学术激情、对学术事业的执着和坚守，在看似积累深厚到几乎让人无法措手的宋史研究领域，拓展出新的气象，创作出了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的学术精品，对引领和深化宋史研究，无疑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有望成为宋史乃至宋元文学研究领域最具潜力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进行运用与订误，以一种历史学家异常特别的视角和文学家通俗流畅的语言，以生动活泼的笔触娓娓道来，从内容、形式到主题指导，乃至人物描述等，都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和一些必要的理论基础。在南宋文学研究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成果中，突然注入一种难能可贵、貌似平常实则独特的研究方式与探索精神，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掩卷而思，不禁浮想联翩，享受到阅读与思考的愉悦。这或许和王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长期从事历史与古籍的编辑，先在中华书局工作，后到日本从事学术研究有关。正所谓“跳出三界外，反观红尘中”“入乎圈内又出乎圈外”，故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摘下单调的有色眼镜，打破文史哲分科的疆界，贯通无碍、入木三分，对宋元时期文化传统变迁的全貌及本质作出如此深刻细致、惊心动魄的分析解读，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和历史意识中对南宋历史与文化的关系作整体化、全景式的观照，揭示了南宋历史丰富多彩的面貌，为世人了解这段历史的多重面向提供了异常珍贵的史料与见解。

我们认为，王瑞来关于宋元变革论的一系列论文，既充满感情，又客观公允，不仅仅是宋元历史研究、宋元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都将从这些引人入胜的论述中获益。王先生所显示的学术视野，所提出的研究话题，所揭示的众多研究线索，具有改写宋元历史、南宋文学史研究版图的积极意义，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与探索。

从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这些学者都把自己摆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和现实世界的经纬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干谒现象的起因、发展及特点作了某些直觉或理性的把握。那种雄浑的气势逼人而来，以其深沉的思考和敏锐的探索，向我们展示了有才华、有责任感、心境洒脱、性情温润的优秀学者所作的多方面的可贵开拓，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自我的期待。他们的研究立足于南宋士大夫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生活资料、生活作风、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生活气息乃至生活待遇，广泛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文化学等诸多领域，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细腻的审美体验和多元的思维方式，有力地印证了自己提出的学术观点，凭借深厚的学养、广博的学识，对阅读者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启示作用，体现出文化视野下南宋文学研究思路的多棱面，为我们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然而，和干谒与文学的关系在南宋文学史上的实际情况相比，这些研究远未达到其应有的局面。在搜集资料、梳理脉络之后，我们集腋成裘、积沙成塔，发现：一部南宋文学史，社团林立，流派众多，错综复杂，更有特立独行、卓然自成一家者的出现，使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南宋士大夫中名流印可、荐举之风、豪华奢纵之习盛行，高压政治与冗官政治加剧，养士之风、士人入幕之势普遍风行，以及科举入仕之艰难，都导致干谒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南宋文人无法逃避的一种命运，一段普遍存在的人生选择。南宋文人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干谒奔走。利禄之途所在，让士子趋之若鹜。要参政，要进入仕途，要想有所作为，要想实现人生的理想，就必然有干谒之行为。那么对南宋士人来说，无论是进入仕途的社会政治之路，还是内在的心灵旅程，无疑都打上了当时干谒风气影响的深刻烙印，围绕着干谒这一文化现象又产生了多层面文学活动的互动。

南宋活跃的文学流派、频繁的文学社团活动、兴盛的文学批评理论以及那一特定时代很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与当时文人的干谒行为都有着紧密的关系，要是不认真去梳理阐

述,给予允当的评价,那么南宋文学研究将是不全面的。从已有科研成果的研究广度和深度看,“南宋干谒与文学”这一课题,应当还有很大的深化空间。虽然,分别对姜夔、刘过等江湖文人干谒活动作研究的文章已有一些,但绝大多数南宋文人,甚至是南宋时期的诗词名家如李光、赵鼎、黄公度、陈亮、陆游、叶绍翁、辛弃疾、杨万里、刘克庄、宋自逊、张元幹、朱敦儒、戴复古、吴文英等,还较少有人从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的角度去加以注意。至于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对南宋文人群体人格精神的整体研究把握,则更少有人从干谒的角度去观察其发展与演进,缺少新的视野和更深层次的开掘。前人时贤往往局限于对某一重要的文人进行考察,而能综合社会变迁、文坛创作、文人群体、时代风尚来作宏观研究者则较少。这就难以充分深入地把握南宋文人的行为方式、心灵活动的演变历程,也无法专门关注南宋文人的生存方式、心态变化与文风流转衍变的内在联系,对南宋文学的研究也就很难深入下去。这对于客观深入地了解、认识和评价南宋文人的创作实绩,无疑有蒙尘、遗珠之憾。

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一道河流上下游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是想将现实问题与历史思考相联系,以从古到今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且随着社会发展更加推陈出新、隽永悠长的“干谒”这一文化现象为独特视角,以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文人创作与请托延誉活动的互动为线索,以南宋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内容,探究当时文人的生存困境,思考文人摆脱困境、诗意栖居的生存之道,对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进行观照与反思,是我们研究时努力追求的精神境界和渴望实现的美好愿望。

大量事实表明,干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交情世态的常见行为。梳理和阐述干谒与文学之间深层复杂的内在联系,揭示南宋时期的文化原生状态,是全面、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的文学如何表现人的价值、人的行为、人的心理、人的形象、人生的意义、人际的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研究。系统研究南宋文人的干谒活动、干谒方式及其干谒心态,研究南宋士大夫在特定生活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特征,研究他们对宇宙、生命、自然和文化的思考,以及他们的生存方式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认识和考察宋人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历史面貌,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对于拓展宋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和推动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有极其重要的启示。

二、问题意识：创新的尝试与期待

干谒活动,是南宋文人普遍经历过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社会一种特有的传统文化,干谒有其自身的生成、发展规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围绕着南宋文人的干谒生活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较集中的讨论,把南宋文人定位在当时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综合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民风民俗等社会文化因素,真实地还原南宋文学的文体特征,这在文学价值论与文学本体论的学科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上,是一种新的尝试。

具体而言,我们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如下:

(1) 南宋文人谒客的身份角色及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种种特点,他们的心态情感、

人格特征、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大多是前人时贤未曾留意或不甚了然的，他们谒客身份角色的自我认定与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更少有人问津。南宋的社会文化环境是通过文学创作主体这个内部因素而对文学的新变和繁荣起作用的，我们将在课题中考察当时干谒活动之风的盛行与文人角色的改变。

(2) 将干谒活动与南宋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纳入研究的视野。对南宋文学创作主体人格精神的演变进行一番梳理勾勒，着重探讨南宋文人人格精神的形成与特点，并对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进行阐述。

(3) 南宋干谒之风的渗透，影响了整个时代文人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改变并充实了南宋文学的思想内容，铸就了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南宋文人的生活环境，作为特定历史文化下的产物，既承载着传统与历史的遗绪，体现出传统社会文化心理的存留，又反映着时代观念的嬗变，是一种深含历史积淀与时代特征的独特现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形成南宋文学独特风貌的特定生活背景，我们将对这一环境背景进行一些描述。

(4) 将南宋文人的身份角色、哲学思考与文学中所体现的创作主题、艺术风格相联系，发现南宋文学在创作主题上有许多以前文人未曾表现或较少表现过的种种复杂心理和人生体验，在艺术风格上也有许多新变化，我们从干谒活动的角度对其展开具体的阐述。

(5) 阐明南宋文人在干谒活动中养成的自矜狂傲、压抑自饰、愤懑悔恨、忍辱负重的精神气质和纵横求知的审美趣味，揭示他们追新逐奇的创作风格与干谒之士审美理想的关系。

(6) 战国策士的纵横精神和魏晋名士的风神气骨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深刻、最易触动南宋文人内心情感的意象，反映了他们在干谒生活中崇尚战国时期纵横家和魏晋名士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质的热忱，展示出他们性格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精神，表现出他们人格精神的多重侧面，从而形成南宋文人好议论、好品评、好逞才使气的显著特征。我们在本书中具体探讨南宋文人干禄仕进时崇尚而仿效的楷模，并进而探求这种精神渗透于干谒行为中，并对象化在干谒文学作品中时，对文学风貌产生的影响。

(7) 南宋文人的干谒请托活动，使王霸雄图的题材取向渗透至他们的审美观念和忧患意识中，并影响到他们的情感活动和创作心理。我们在本书中着重探讨南宋时代的文化特征，并揭示战国策士纵横精神及文风对南宋文人心理和创作的影响。

(8) 南宋文人的交游唱和活动，是他们干谒求知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他们的思想感情、创作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出南宋文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情感、心路历程和生活体验，使群体的创作共性凸显出来，呈现出鲜明的创作范型。我们在本书中揭示南宋文人群体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文化内涵。

(9) 我们以干谒求知活动为中心，从南宋文人群体的总体情况着眼，探讨文人干谒风气对南宋文学发展的影响。认为：文人干谒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服务于文学的发展。由于干谒行为总是以干谒者的现实利益作为关注的焦点，因此，伴随其中的文学创作与对待文学创作的观念和态度，就不可能总是那么积极和纯粹理想主义的，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

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削弱,躁进的风气与文学作品工具化、商品化、礼物化^①的倾向。

(10) 向人索序及为人作序印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现象。我们通过深入研究施蛰存主编的《词籍序跋萃编》、祝尚书编的《宋集序跋汇编》、中华书局编著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及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王水照编的《历代文话》中有关南宋文人作品的序跋文字,发现这些文字大都是应干谒者而作,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实现援引延誉的目的,甚至有些就是写给干谒奔走之士以为“阔匾”^②之用的。南宋时人往往利用其来谋职乞食,盛烈在诗中道:

寒江买棹催遄征,何如缓泛六桥寻鸥盟。侯门怀刺谒掌宾,何如散策孤山探梅信。吟隐豫章之耳孙,调高琢句期颛门。西江不住来西湖,唤醒晚唐诸老魂。有时吐出惊人语,定须贵杀雒京楮。脍炙人口徒属屨,还来双字不堪煮。行吟荏苒岁欲暮,束装又问吴中路。节翁旧有珠履缘,何况荐书袖无数。此行一句直万钱,十句唾手腰可缠。归来卸却扬州鹤,推敲调度权架阁。^③

其中所言“侯门怀刺谒掌宾”“节翁旧有珠履缘,何况荐书袖无数。此行一句直万钱,十句唾手腰可缠”,反映了当时谒客以“荐书”“怀刺”行吟江湖的情况。在社会活动中,只有遵循现实原则的人才能获得成功。从干谒—序跋—印可这一因果互动关系中,还能挖掘出当时文人对文学的认识、思考、研究和总结,这些序跋虽然大多是应人请托而作,主要是为了帮干谒者援引延誉,起到名流印可的作用,但因涉及当时的文化环境、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很值得留意。它们与当时理论性的专著、随笔式的评论、作品中的评点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个性、人生态度、人际关系和他们对文学的认识、思考、研究和总结。通过研读南宋存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并对照当时文人为这些作品所写的序跋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干谒与当时文人群体、文学流派、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之间深层复杂的

① 礼物在中国人际关系中十分重要,详参杨美惠著,赵旭东、孙珉译:《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阔匾是南宋时江湖游士乞求权贵所写的介绍信。元·方回:《瀛奎律髓·寄寻梅》载:“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者,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40页)钱谦益《初学集·王德操诗集序》亦载:“诗道之衰靡,莫甚于宋。南渡之后,而其所谓江湖诗者,尤为尘俗可厌。盖自庆元、嘉定之间,刘改之、戴石屏之徒,以诗人启干谒之风。而其后钱塘湖山,什伯为群。挟中朝尺书,奔走阊台郡县,谓之‘阔匾’,要求楮币,动以万计。当时之所谓处士者,其风流习尚如此。彼其尘容俗状,填塞于肠胃,而发作为语言文字之间,欲其为清新高雅之诗,如鹤鸣而鸾啸也,其可几乎?……以宋人之阔匾为介绍,求其诗之不尘俗,何可得也?”(《初学集》卷三十三,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中册,第946-947页)都谈到了“阔匾”及其对当时诗风的影响等问题,乞求权贵写介绍信,然后通过介绍信去干谒乞食,并不自刘过、戴复古开始,整个南宋士人们“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而“要求楮币”的行为盛行一时,是当时的“习尚”,值得我们宋人文集中所存赠序、酬唱文字中去挖掘探讨。其他文体如四六文、制诰章表亦与文人的干谒奔走行为有关。南宋文人孙觌就善于奔走干谒,为人谄媚依违、无道德操守,但博学能文,尤其擅长撰写四六文,与汪藻、洪迈、周必大声名相当。周必大称其“笔势翩翩,高出流辈”,章疏制诰表奏“明辨骏发,每一篇出,世争传诵”(宋·周必大撰,周纶编:《文忠集》卷五三《孙尚书鸿庆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7册,第559页)。

③ 宋·盛烈:《送黄吟隐游吴门》,宋·陈起编:《江湖后集》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7册,第856页。

关系。

南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十分重视请人给自己的作品作序，也十分精心创作为人印可延誉类的序跋文字。这一现象值得注意，我们初步认为这跟当时士人崇拜名流、迷信权威的心理有密切联系。崇拜名流、迷信权威，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性格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一直影响着今天序跋类文字的书写模式。

三、渴望超越：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文化视野下的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研究”的目标是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角度入手，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南宋文人的干谒活动与文学创作之间深层复杂的密切关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南宋文人群体的干谒活动为中心，着重分析他们在干谒活动中所经历的种种尴尬狼狈、精神苦闷以及他们超越苦难、消解苦闷的途径和过程，以此来透视干谒活动中南宋文人心态情感、人格精神的演变及其与文学新质生成的内在联系。

在交叉学科研究的视野下，我们研究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整体观照

南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①我们将南宋文学作为唐宋、宋元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进行整体研究，并以干谒活动为中心，运用谒客人格这一范畴，来探讨南宋文人谒客人格形象的建构与创作实践活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对南宋文学进行整体研究，是不少学者所采取的方法，能收到囿于单一文人研究所不能达到的效果。^②南宋文学在唐宋文学和元代文学之间起到了一种整体嬗变和阶段演进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从南宋时期文人群体风格的剧变中表现出来的。我们一直重视南宋文学

① 详见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一代词宗夏承焘平生研究词学亦十分注重南宋，曾说：“我平日读词最看重南宋。”（夏承焘：《西湖与宋词》，《夏承焘集》第8册《词学论札》，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② 王兆鹏在《新世纪以来词学研究的进展与瞻望》中专门就“视野的开拓：从个体到群体，从微观到宏观”举例说明道：“20世纪的词学研究，大多是词人个体的研究，词人群体研究的专著只有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进入本世纪，研究视野渐从词人的个体研究延伸向词人群体研究，特别是博士论文，多以群体或时段研究为选题，如彭国忠《元祐词坛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姚惠兰《宋南渡词人群与多元地域文化》（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金国正《南宋孝宗词坛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丁楹《南宋遗民词人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李艺《金代词人群体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群体研究不是个体研究的集合，而是对一个时段或一个地域的词人群体进行整体的观照，以揭示词人群体间的互动关系和共同的创作趋向，因而群体研究能发现个体研究无法顾及和观察到的问题。”（王兆鹏：《新世纪以来词学研究的进展与瞻望》，《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第147页）